



沈昌文的签名本

俞晓群

近年来写书房生活,我经常提到沈昌文的签名本。此事源于许多年前,沈先生清理自己的书房时,送给我100多箱书。最近半年间,我为沈先生撰写年谱,将他的赠书一本本整理出来。在陆陆续续地翻阅中,我发现里面有许多别人赠送的签名本。“许多”是多少呢?目前整理出来有200余册不止;有签给沈昌文的书,有签给沈氏夫妇的书,有签给《读书》编辑部的书,有签给其他人的书。细心阅读这些书,可以知道许多有趣的故事。

先说不是单独签给沈先生的书,有很多本。比如签给他与夫人白大夫的书。白大夫早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,也就是沈阳那所医学院。白大夫认识很多文化官员、文化名人,不是靠沈先生,而是她曾经在湖北咸宁向阳湖“五七干校”卫生所工作过。那里有太多的知名人士,像冰心、冯雪峰、沈从文、张光年、臧克家、萧乾、陈白尘、冯牧、郭小川、刘炳森、王世襄、周巍峙、罗哲文、金冲及、陈翰伯、王子野、刘果、周汝昌、司徒慧敏等等。白大夫为人极好,与他们结下了很深的友谊。沈昌文也在那里工作过,沈先生时常开玩笑说,我的作者都是白大夫的患者。名人们送书给白大夫或署上她的名字,也是自然的事情了。像屠岸《萱荫阁诗抄》、金春峰《冯友兰哲学生命历程》等,都是签给沈氏夫妇的;李季夫人赠送《李季诗选》,直接签给白大夫。

再如签给《读书》编辑部的书也有几册,黄忠晶《风从两山间吹过》,张元《谈历史,话教

学》,杨布生、彭定国《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》等。张元是新竹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,他题词写道:“六年前写的小书,是给中学历史教师参考的,在34、163、232等页提到《读书》,希望台湾的历史教师也能知道有一份叫《读书》的刊物水准很高,非常精彩。当然,这得感谢昌文先生。张元敬呈一九九九、一、卅一、寄自新竹。”

再说签赠别人的书,也有很多本。比如签给沈先生小女儿沈双的书,有娜斯《想像舞蹈的马格利特》,黄昱宁《阴性阅读,阳性写作》。沈先生有两个女儿,大女儿随母亲学医,小女儿随父亲学文。早年沈先生请最好的老师给沈双辅导,曾经跟许国璋学过英语。沈先生说那时生活拮据,只会在家里煮骨头汤犒劳老师。后来沈双考上北京大学西语系,毕业后出国深造,在国外大学教书,没能从事出版工作,但人文领域的朋友还是很多的。

别人的签赠本还有很多,比如金克木签给贾宝兰的《无文探隐》,周希中签给连卫的《批判与知识的增长》,姜德明签给徐淑卿的《姜德明手语》,吴兴文签给徐淑卿的《藏书票风景——收藏卷》,赵健伟签给于奇的《教育病》,景跃进、张静签给朱小权的《现代化的动力——一个比较史的研究》等等。沈先生的书架上出现这些签名本,原因很复杂,我却想到他的雅在《〈读书〉十年》中,经常提到编辑部交换图书的故事;还会想到那段趣闻:吴彬在《读书》编辑部工作时,见到沈先生背着一个大书包走进来,她会

笑着大喊:“老沈来啦,都收好自己桌上的书。”时而错拿几册签名本,也不是什么怪事。倒是那位朱小权,不但有签名本,还有他自己的用书,也出现在沈先生的书架上,如侯外庐《中国思想通史》第五卷,扉页上用铅笔签着“晓权”;1981年购于复旦”。

下面按照年代顺序,我将沈先生的一些签名本,简要开列出来:1962年沈先生自签《欧·亨利短篇小说选》;1979年杨静远签赠《哈丽特·塔布曼》;1980年王庚虎签赠《高尔基论报刊》;1981年冯亦代签赠《八方集》,屠岸签赠《十四行诗集》;1983年彭柏山夫人朱微明签赠《战火中的书简》,仓修良签赠《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》;1984年杨静远签赠《勃朗宁姐妹研究》,柳鸣九签赠《巴黎散记》,舒謏签赠《万里烽火》,苏晨签赠《野芳集》;1986年屠岸签赠《萱荫阁诗抄》,王忠琪签赠《苏联七十年代中篇小说选》;1987年王宗炎签赠《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》,周介人签赠《文学:观念的变革》;1988年陈鼓应签赠《存在主义》,李锐签赠《怀念甘篇》,唐湜签赠《遐思——诗与美》《月下乐章》;1989年吴岩签赠《泰戈尔抒情诗选》;1990年胡其鼎签赠《铁皮鼓》,葛剑雄签赠《普天之下——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》,史丰收签赠《史丰收速算法》,陈晓林签赠《学术巨人与理性困境》;1992年金克木签赠《文化猎潮》,陈万雄签赠《五四新文化的潮流》;1993年许明签赠《轻拂那新理性的风》,郑涌签赠《批判哲学与解释哲学》;1994年金发荣签赠《鸿鹄翱翔——弥尔顿和〈失乐园〉》;1995年姜广辉签赠《理学与中国

文化》,张芝联签赠《约原著作选辑》;1996年邵东方签赠《论胡适、顾颉刚的崔述研究》;1997年丁鲁签赠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,杨玉圣签赠《中国人的美国观》,黑马签赠《孽缘千里》《劳伦斯散文选》,王红旗签赠《宇宙的重构》;1998年王学泰签赠《燕潭集》,邓正来签赠《国家与社会》,范维信签赠《修道院纪事》;1999年丁伟志签赠《桑榆槐柳》,黄爱东签赠《老广州:履声帆影》;2000年耿志云签赠《蓼草集》,李文俊签赠《福克纳评传》;2001年杨武能签赠《走近歌德》,易丽君、袁汉谿签赠《洪流》,康笑宇签赠《谈笑无期》,刘麟签赠刘季星译《果戈理散文选》;2002年马立诚签赠《木乃伊复活》,黑马签赠《心灵的故乡》;2003年耿志云签赠《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》;2005年胡企林签赠《书林拾叶》;2008年舒昌善签赠《蒙田》,潘石屹签赠《我用一生去寻找》,智效民签赠《六位哲学家》;2011年余世存签赠《非常道II》,欣力签赠《八声甘州》,李世洞签赠《拾贝刺集》;2012年古农签赠《闲话日记》;2014年陈昕签赠《出版忆往》;2015年李文俊签赠《西窗看花漫笔》,祝晓风签赠《读书无新闻》。

在这些签赠本的背后,有许多有趣的故事,本文略说几段:

先说刘麟签赠给沈昌文的刘季星译《果戈理散文选》,此书后记中说,他曾经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过《戴灰眼镜的人——屠格涅夫散文集》。那本书出版于1997年,我还是责任编辑。刘季星在那本书的序言《窗外的风景》中,感谢了几位帮助者:高莽、林海音、沈昌文等。其实《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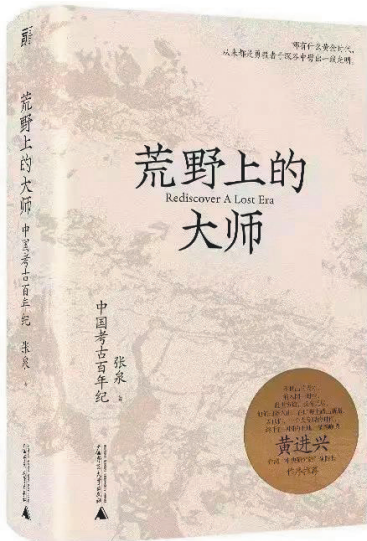
世纪万有文库》外国文化书系的一大特色,就是收入许多俄罗斯文学著作,这也是总策划沈昌文的贡献。回到《果戈理散文选》,刘季星后记谈到此书的遭遇,诸如《与友人书简》被沙皇查禁,受到别林斯基的批判。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因宣读果戈理与别林斯基论战的信件,作为罪名之一被判处死刑。屠格涅夫不完全赞成《与友人书简》的内容,认为2/3的信件可以删去,但他依然称果戈理是伟大的诗人、伟大的艺术家、伟大的人物,“即使我不同意他的见解,我仍然恭恭敬敬地对待他。”另外,别林斯基批判果戈理时,列夫·托尔斯泰刚走出大学校门,他在60岁时第三次阅读《与友人书简》,他把果戈理比作17世纪法国的帕斯卡尔,还在自己的出版社重印《与友人书简选》,改名为《果戈理,人生的导师》。

再说屠岸签赠给沈昌文、白大夫的两本诗集,他在《萱荫阁诗抄》后记中说:“我的母亲在暮年曾指出我的诗‘工力不够’。我在大学里学的是铁道管理,我没有系统地学过中国文学。”还有1962年屠岸的《十四行诗集》出版;1963年此书再版时,屠岸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《译后记》,但因故未能出版。直到1980年此书得以重印,卡之琳从家中取出保存了15年的屠岸《译后记》,又从上海译文出版社取回保存15年之久的译本修订稿,屠岸才能够将此书再次修订、再次出版。

还有冯亦代签赠《八方集》,是哪“八方”呢?冯亦代、周汝昌、黄苗子、黄裳、潘际桐、吴泰昌、吴德铎、峻骥。

他们的背影从未远去

杨一涵



记录、论文和专著,让我们可以更清晰地回望一代大师走过的路。”

《荒野上的大师》记述的是更为广义的考古,即通过寻获古人的实物遗存进而研究人类历史,其范围涵盖地质学、考古学、人类学、建筑学、语言学、古生物学等。近代中国决心于“考古之荒野”上披荆斩棘,大师们走出书斋,走向田野,他们筚路蓝缕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中,战争、疾病、匪患、风雨伴随着大师们每一次重大发现和每一次学术突破。他们忍受病痛和饥饿,绝食离散与困苦,如杨铨所说:“我辈于乱世求研究,本为逆流之妄举。”但也是对科学的求索和对学术的坚守,使他们成了荒野之上冉冉升起的璀璨群星,交相辉映。他们的名字是陈寅恪、丁文江、李济、赵元任、傅斯年、贾兰坡、梁思成、林徽因、梁思永、胡适、梅贻琦、吴宓等。

这一代人,他们作为知识分子,将读书人的身份与更为宏大的社会责任紧密相连,展现出深厚的家国情怀。李济病榻之上,依然凭借着过去的记忆与资料描绘着安阳的轮廓;高去寻在异国他乡学成归来后,放弃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致力于辑补老师梁思成的研究工作。最终将“侯家庄”系列发掘报告呈现于世,扉页上写着“梁思成遗稿,高去寻辑补”。梁思成在为《宋(营造法式)》注释作序时,反复斟酌词句,试图以一种更为贴切的方式证明他们的探索价值。

作者张泉在每一章的开头设计都充满了画面感,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,亲历大师们的人生冒险。这些大师们的学术和人生历程,正是叙述者讲述的核心。这种叙事方式,颠覆了传统的时间线性叙述,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影像化写作风格。“荒野”与“大师”的全新组合,充满了代入感,将大师们的探索细节淋漓展现,使读者感受到他们的挣扎与坚持。大师们走出后世所赋予的瑰丽想象,展现出他们真实的、痛苦的、未经修饰的求索过程。正是大师们当时的诸多重大发现,才让中国在世界古舞台上有了更多的话语权。

生命之盐

洪兆惠

读书、人文学科的看法,讲如何度过晚年,准备死亡,显示出斯坦纳独有的睿智。

我欣赏斯坦纳的智识生活状态。谈话中,智识生活的那种优雅和从容随处可见。智识生活的一个标志,就是执着追寻人生问题。斯坦纳对人的原生的追问,是人的生命之盐,他的生命因追问而活跃。书中的第三节“每一种语言都是打开新世界的窗口”,提出这样的问题:话语无法进入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?在现实生活中,人的很多交流发生在言说之外,交流超越语言。这也是近两年纠缠我的一个问题。我觉得好小说的内核,话语无法进入,或者说,我们无法说清小说的内核是什么,它的功能怎样,但是凭它,我们完成了与小说交流,实现了读者与读者间的共鸣。这一节富有启示性,我反复阅读,边读边琢磨面前的问题:小说的内核是什么?小说的内核在人性深处如何发酵,实现心心相通?

第二本是冯思纯编的《废名短篇小说集》。去年十月,我特别

想静下来,待在家里,远离喧嚣,读那种淡而有味的小说,于是选择了废名。手中除了这个选本外,还有陈建军编订的《废名短篇小说》和《废名长篇小说》。我选这本,原因在于编者是冯文炳之子,捧在手上感觉亲切。冯文炳为废名真名。

废名没让我失望。读他的小说,我感受到一种难得的安静。这种安静,还真不像有些研究者说的那样,隐逸文人嘛,写东西自然有隐逸气和出世色彩。我的阅读感受是,这安静来自于他和平淡的叙事。讲述时,他把握自己的情绪,沉稳、不躁,有板有眼,慢慢道来,事件和情感犹如一滴墨落在宣纸上,舒缓恣开。读完一篇,我会愣一会儿,感觉意味绵延。有味道,是废名小说的特质。正是小说的味道,才让我读时安静。在安静中去品,越品越有味。读《阿妹》时就是这种状态。小说写阿妹的一生,而她她的一生仅仅7岁。作者慢慢地说,心平气和,这种安静慢,容我仔细咀嚼。我没有看出废名小说有什么红尘意,反而觉得,小说中

充满悲悯情怀。废名小说追求一种宁静,而我读完并不宁静,悲悯在宁静中悄然滋生。

有人说,废名小说晦涩。我不同意。对于废名的诗笔禅趣,作为读者,只要我们用心去体悟,就不存在不好读、读不懂的问题。

第三本是王瑞芸的《杜尚传》。我手中有三本杜尚的传记作品,王瑞芸的《杜尚传》,饱含作者对传主的欣赏。我认同这种欣赏,共鸣决定了我的选择。美国人汤姆金斯写的《杜尚》,同样值得一读。汤姆金斯也捕捉到了杜尚的真气味。他在《自序》中写道:“杜尚式的自由和他运用自由的生命方式是他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。”杜尚在美国刚刚出名,汤姆金斯就采访过他,采访中杜尚表明,我不是“反艺术家分子”,我是“不当艺术家分子”。

真是一个怪人,一个在艺术上贡献卓著,曾开启动态雕塑和行为艺术的人,却不想当艺术家。杜尚最了不起的作品,是他自己的生活,用作家亨利·皮埃尔·罗谢的话说,“杜尚最好的作品是他度过的时光。”杜尚的人生

是一部大书。杜尚的活法独一无二,不可复制,其精髓是超然。他生活在超然中,甩开一切身外物的羁绊,凡事随心随性。超然是一种解放,激活了杜尚在艺术上的创新能力;超然也是一种力量,使杜尚在名利场进退自如。

废名的宁静和杜尚的超然,与斯坦纳的追问一样,是他们的生命之盐,为他们活着所必需。

作者简介

洪兆惠,辽宁省文联原巡视员,辽宁省文联原研究馆员。长期从事文艺评论工作,曾任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二届、第三届主席。曾获第三届“田汉戏剧奖·理论奖”二等奖、首届“辽宁文学奖·评论奖”,首届“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·评论奖”。



现在读书,主要读人。我对形形色色的人好奇,特别着迷那些极致生命。除了小说,我喜欢读书信、日记、笔记、访谈、传记,试图通过阅读接触一个个鲜活而真实的人。下面介绍的三本书,都与“读人”有关。斯坦纳、废名、杜尚,影响着我对生命意义的领悟。

第一本是《漫长的星期六:斯坦纳谈话录》。它由作家阿德勒在2002年到2014年间对斯坦纳的多次访谈整理而成,书很薄,8万多字,却有嚼头。我于2021年元旦正午时读完,那之后,它成了手边书,不时拿起,翻到哪页读哪页。还有一两次出门带上,在高铁上整节整节地读。书中记述了斯坦纳接受采访时在73岁到85岁间,正是一个人沉迷于内在冥想的年纪。他一旦开口,便坦率真诚,讲年轻时的经历,讲自己对

聊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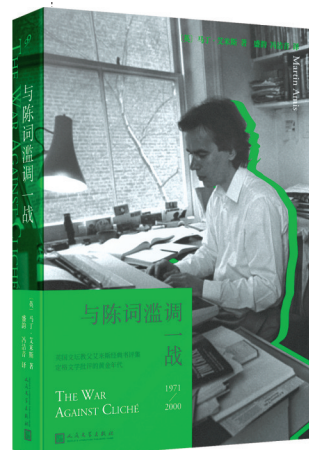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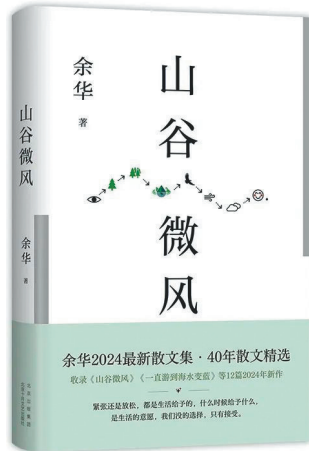
多好,像风一样清新的文字

李海卉

“原来不写小说的余华,才是真正的余华!”在新近出版的散文集《山谷微风》中,余华回忆了自己的童年和成长经历,并讲述了自己的婚姻和家庭趣事。被口吃困扰、和哥哥打架、偷吃蛋糕、差点溺水身亡、一直游到海水变蓝……童年的余华既有敏感自卑的时刻,又时常充满奇思妙想和探险精神。而成为父亲后的余华,生活发生了转变,时而幸福、时而窘迫、时而哭笑不得。余华用他特有的幽默和通透,记录下日常的点滴美好,用细腻的感受和精妙的文字告诉我们,一阵微风,一股清流,一顿美食,一场相遇……都是生活给予我们的馈赠。

这里有真实的余华,余华编选自己40年来的散文,《山谷微风》中首次收录他今年创作的12篇新文章。除了今年的新作,余华还从1984年以来创作的散文作品中,精选了17篇文章收入书中,从1984年至2024年,呈现了作家半生的经历与感悟。

有趣的是,那一篇《山谷微风》首发于微信公众号,当天阅读量迅速突破“10万+”,引爆热搜。余华从山谷里的微风徐徐,联想到少年时,在炎热夏天寻找的穿堂风和蒲扇风。“你将像山上的风一样自由。”“紧张还是放松,都是生活给予的,什么时候给予什么,是生活的意愿,我们没得选择,只有接受。”余华写道,“多少豪杰壮举,不论是壮士一去不复还,还是壮士胜利归来,只要进入历史的长河就会无足轻重。维吉尔说:‘一丝微风勉强把他们的名字吹入我们耳中。’”



余华写的散文,汪洋恣肆,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,他用灵动、幽默的文笔,写下了一篇篇充满洞见的文字,不像读他的小说那样沉重,心情将会是轻松愉快的。

有人说,余华是一个被作家耽误了的段子手、脱口秀演员。莫言就曾讲:“余华是逗哏,我是给余华捧哏的。”典型的例子就是余华曾讲了一段往事,说几个作家一起踢球,然后他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去安排当守门员。曾几何时,我们对作家的认识多停留于一种严肃的想象。当他们从作品背后走进现实世界,让我们看见了一个个活泼、有趣、鲜活的灵魂。

写作就是写生活,把一种生活写出来,让身处不同环境、不同时代的人,感觉到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生活。余华曾写道,“作家的职责是去发现一切可以使语言生辉的事物。”在余华看来,“作家是否能够使自己始终置身于发现之中,这是最重要的。”写作就是去发现,把生活经历变成一种心理经历。

余华的散文常常是在循序渐进的细水长流中,华丽地转向一个令读者无限遐想的深海,那里惊涛拍岸,唤起站在岸边的人的共有记忆,带给人们五味杂陈的感受。“每个人的记忆都是自己的私人文学”这就是记忆与现实共舞的价值所在。

去年逝世的英国著名作家马丁·艾米斯曾谈到一个重要观点:所有写作都是反对陈词滥调的运动,不光反对文字的陈词滥调,也反对头脑和心灵的陈腐。

《与陈词滥调一战》是马丁·艾米斯的文学评论集,涵盖了作家从1971年到2000年来近30年的文章,这些评论集中于深度书评,也涵盖了广泛的社会话题。他以磅礴的阅读储备,为塞万提斯、弥尔顿、约翰·多恩、简·奥斯丁等经典作家的作品贡献了非凡的解读,同时也以其犀利而辛辣的笔触,评判了20世纪下半叶英语文坛代表人物如纳博科夫、厄普代克、V.S.奈保尔等人的作品。他说:“我也会引用陈词滥调作为批判的样本,我也会引用与之相反的清新、有活力、值得回味的文字去赞美。”

在500多页的篇幅里,几乎找不到能体面地挂在他人新书书封上的词句。也就是说,收在这本评论集中的书评没有寒暄和客套,没有阿谀奉承,有的基本上是毒舌和匕首。马丁·艾米斯对陈词滥调发起一波接一波的攻击:评论D·M·托马斯的小说,“在短程一段里我已经数到了五处陈词滥调,这些句子唤起的只有已经枯竭的想象力,托马斯似乎只会用俗套里打滚。”在正面进攻托马斯的同时,艾米斯还抽空带了一脚当年风靡世界的《苏菲的选择》:“简直是陈词滥调堆出来的百科全书。”

马丁·艾米斯在《与陈词滥调一战》的前言中讲述,“文学评论对文学来说并非必要,但文学和评论两者对文明来说都不可或缺。”英国文学批评家迈克尔·伍德认为,批评是试图开启一段对话,对象最好是那些读过一些你曾读过的书的人,当你努力寻求你感兴趣的理由时,他们会明白那种兴趣,因为他们或许已经有同感,以此来开启一段阅读隐喻的寻求过程。

可以说,《与陈词滥调一战》既是一部充满个性和智慧的私人阅读史,也是一份带着睿智的欧美文学指南。马丁·艾米斯让我重温了一个久被遗忘的道理:书评是冒犯的艺术。